

徐悲鸿

一扫凡马万古空

马 骏马，一匹匹神爽气清 劲骨嶙峋。或扬鬃奋蹄 或独立苍茫 或嘶鸣不已 或徘徊踟蹰 真所谓“一扫凡马万古空”。——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大师徐悲鸿的笔下千骑。徐悲鸿在中国画坛上的地位，犹如泰山北斗一般，他画的奔马已经成为中国画的一个象征。其实，他自己就是一匹奔腾不息的千里马，为了他挚爱的祖国，为了祖国的艺术事业，一直跑到生命的最后一息……

一、“江南贫侠”

徐悲鸿是江苏省宜兴县屺亭桥人。他出生的1895年，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。家乡优美的自然景色虽然陶冶了他的心灵，但中国农村日趋破败的现实，也过早地在他心头蒙上了阴影。父亲徐达章是位有名气的乡村画师，在画画之外

还须耕种几亩田地，才能维持全家的生计。他无钱送爱子读书，便自己给孩子当老师。徐悲鸿悟性很高，字、画、诗、书都进步很快，10岁时就成了父亲绘画的好帮手。

有一年，杞亭桥镇被大水淹没，田地里颗粒无收。他即跟随父亲浪迹江湖，卖画为生长达数年之久。17岁那年，父亲病故，徐悲鸿便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。自家的遭遇，乡亲们的遭遇，使他对人间的不平特别敏感。他十分仰慕从说书人口中和书本上知道的那些匡扶正义的英雄豪杰，期望自己也成为那样的人。他自刻了一枚“江南贫侠”的印章，以明心志。

少年徐悲鸿的绘画就已名闻遐迩，兼了两所中等学校的图画课。但他并不满足，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于1915年夏天前往上海。他渴望更多地了解世界，渴望创出自己的一番事业。临行时，一位朋友赠给他一句话：“人不可有傲气，但不可无傲骨”。他深以为然，毕生奉为座右铭。

然而十里洋场的上海以它固有的喧嚣和冷漠，接待了这位乡村青年。他处处碰壁，连糊口的工作都找不到，身无分文，流落街头。一切都绝望了，徐悲鸿萌发了死的念头。若不是在上海结识的穷同乡黄警顽及时赶到黄浦江边，他就葬身江底了。两人在江边抱头痛哭。

一个偶然的时机，徐悲鸿结识了湖州丝商黄震之。黄震之慧眼识人，非常看重徐悲鸿的才华，在自己破产的情况下，资助徐悲鸿报考上海震旦大学。徐悲鸿度过危机后，立定主意要去世界美术的圣地法国巴黎求学，报考震旦是预作准备的一部份。

1916年夏天，上海哈同花园的外国阔佬忽发奇想，要办一个“仓圣明智大学”，推崇创造汉字的传说人物仓颉，为此征求也说不清模样的仓颉的画像。徐悲鸿根据古书上有限的记载，画了一幅“四目灵光”的仓颉像，不料竟被选中。他从震旦大学搬入

哈同花园居住，在这里结识了大名士康有为，并行了弟子礼。

徐悲鸿为哈同花园连画了几幅仓颉像，表现出非凡的艺术才能，哈同花园的女主人罗迦陵送给他一笔经费，并答应供他出国深造。当时欧洲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局势动荡，法国不能成行。同时徐悲鸿顾虑外国人的应允靠不住，万一后援不继，又将重复刚到上海时的情景。就决定先去日本，就近考察东洋美术。

由于际遇的变化，徐悲鸿的心情开朗了许多。他和“仓圣明智大学”一位教授的女儿蒋碧微恋爱了，决定带她同赴日本。蒋小姐已许配人家，为避免纠缠，由康有为一手策划，两人私奔。对外仍佯称徐悲鸿去法国留学。

1917年5月，徐悲鸿偕蒋小姐到了日本东京。日本此时文化事业已较发达，新出版的美术书籍相当丰富，还有中国名画的复制品。这都是国内没有的。徐悲鸿没有沉浸在蜜月旅行的兴奋中，他以极大的热情了解日本美术教育体制，大量购买美术品。他跑遍了东京的美术馆、博物馆、书店、画店以及有关学校，得出结论说：“日本的艺术不守旧，会心造物，很值得我们中国画家学习。”半年之后，夫妻相偕回国。

这时是1917年的11月。

二、从北平到巴黎

回到上海，欧战还在继续，法国还不能成行。康有为建议徐悲鸿先去北平（即北京）对中国传统文化来一番研究，然后再出国，必定大有益处。北平是文化古都，藏有大量典籍和艺术珍品，还有诸多绘画名家。徐悲鸿听从康有为的指点，到了北平。

在北平，结识了康有为的大弟子罗瘿公和北平大学校长蔡

元培。爱才的蔡元培早见过徐悲鸿的一幅奔马，当时就对人感叹：“看来这位徐君就是一匹千里马 我国四万万国民中 有多少才俊之士不为世人所知啊！”北平大学没有美术系 蔡元培特设“画法研究会”延请徐悲鸿担任导师。

徐悲鸿如鱼得水，整日沉浸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海洋里。故宫和一些收藏家的书房，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。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，结合自己的绘画实践，他对中国画的弊端看得更清楚，以为重形式以至于向壁虚造，因此对西洋画注重写实的长处更加肯定。所以他在北大讲演常发人所未发，受到普遍注意。

当时的北平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，陈独秀、胡适主编的《新青年》杂志风靡全国，徐悲鸿也深受其影响。他关于中西绘画的见解无疑与新文化运动是直接相关的。他从《新青年》上读到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内心十分佩服。由北大教授刘半农安排 他和鲁迅有过一次聚会。他们很谈得来，很多见解都相同。对这一经历 徐悲鸿十分珍视 常说是“三生有幸”。徐悲鸿还结识了陈师曾、梅兰芳、许德珩等文化界人士，扩大了他的艺术视野。

在蔡元培的大力斡旋下，教育部长傅增湘批准了徐悲鸿的要求，让他以官费生资格赴法国留学。1919年3月20日 徐悲鸿从上海登船，直赴巴黎。夫人蒋女士同行，同船的还有近百名第一批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。

徐悲鸿为宿愿得以实现而精神振奋，一路上画了近百张素描。途中参观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。5月10日 抵达巴黎。刚刚安顿好 就传来北京爆发“五四”爱国运动的消息 徐悲鸿为祖国人民的新觉醒而激动，热烈参加留学生们的讨论，自己又吟诗、唱歌。意犹未尽 又抓起笔来撰写了《中国画改良说》一文 就山水画之改良、人物画之改良，阐述了见解。他对中国画的弊端深恶痛绝，但不是一概否定；对西洋画的长处推崇备至，但不是主

张全盘西化。议论如此深刻独到，使人难以想象他还只是个 25 岁的青年。第二年，北京大学《绘学杂志》创刊号登载了这篇文章，国内画坛为之震动。

巴黎是欧洲文化的明珠，大小博物馆就有 60 来个 藏品丰富精湛，堪称世界一流。徐悲鸿先在徐梁画院学素描，次年考入国立巴黎最高美术学校。他的素描功底，令指导老师、著名画家弗拉蒙惊讶。徐悲鸿以全副精力投入学习，上午在校上课，下午外出画模特儿，晚上在宿舍里读书、画画。每逢星期天，就带上一块面包一壶水，往罗浮宫、凡尔赛宫等处临摹名画，并在临摹稿的背面写上“三年”“四年”字样。意思是三年、四年后 他的临摹稿也要达到原作的水平。而原作的作者是达·芬奇、大卫等艺术巨匠，可见他对自己所定的标准是多么高。他认定，外国人能画出来的。中国人也应该能画出来。

在一次法国艺术家的茶会上，徐悲鸿认识了法国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仰。他对这位大师敬仰已久，只要见到他的作品就要痴迷地看半天。达仰对这位中国青年也有耳闻，相谈之下更觉喜欢。老先生诚恳地邀请徐悲鸿到他的家里去练画，他可以亲加指导。这真是天大的幸运，从此徐悲鸿有了一位令他终生感佩的异国恩师。当时有很多法国青年想拜达仰为师而不得，一位妒火中烧的法国学生叫住徐悲鸿挑衅道：“你们中国人天生低下，就是达·芬奇手把手地教，也成不了材！”徐悲鸿回敬道：“那我们就来比一比，看谁是蠢材！”徐悲鸿的成绩在最高美术学院常常名列第一，蠢材当然不是他。

徐悲鸿不放过一切学习机会。一年一度的春季沙龙美展来了，来自法国全国的精品摆满了巴黎市中心的两座高大建筑。规模之宏大徐悲鸿从未见过。为了一窥全豹，他连午饭都顾不上吃。这天出门时他忘了穿外衣，夜晚回家又遇上雨夹雪，又湿又

冷，浑身颤抖。到家后腹部剧痛，呕吐不止。从此落下了胃痛的病根。

徐悲鸿以有限的官费维持学业和两个人的生活，本来就不宽裕。北洋政府还常常拖欠，到 1921 年干脆断绝了。生活立刻成了问题。临来法国后，哈同花园曾许诺每月资助 300 元，实际却从未兑现。蒋女士多次要徐悲鸿去信催讨，徐悲鸿总是告诫说：人不可有傲气，但不可无傲骨，我们不能把希望放在哈同这一伙外国人身上。没有吃过苦的蒋女士很不以为然，她原以为跟着徐悲鸿是享福的，现在则弄得吃饭都困难。后来，夫妻间的裂痕越来越大。

为了让手中的钱多维持一段生活，徐悲鸿夫妇于 1921 年秋天转住德国柏林。因为战后的德国马克贬值，同样数目的法郎在德国可买到更多的东西。柏林藏有丢勒、荷尔拜因、门采尔、伦勃朗等大师的杰作，早就使徐悲鸿向往。为了省去画室租金和模特儿费用，徐悲鸿把柏林动物园作为自己的写生场所。这里有各种动物，还有一群野性未驯的马。它们在马场上无羁无绊，最利于观察临写。徐悲鸿又是留连忘返，从早晨开门进园到晚上关门才肯离开。柏林美术学院院长、名画家康普，为徐悲鸿勤奋好学的精神所感动，赞叹道：“你对艺术的献身精神，使我看到了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艺术复兴的曙光！”

考虑到将来祖国艺术事业的需要，徐悲鸿不顾生活的窘迫，在柏林购买了很多精美的美术印刷品和价格低廉的名家原作。这些原作确为难得的珍品，价格之低超出想象，徐悲鸿萌生了收购一批将来好办美术馆的念头。为此他向中国驻柏林大使馆求援，衣冠楚楚的大人先生们以虚假应酬他，使他大失所望。他对中国官僚的腐败无能，又加深了一层认识。

生活又不能维持了。1923 年春天，他们回到巴黎，继续半工

半读。徐悲鸿为一家出版社画插图，蒋女士为一家百货公司当绣工。1925年春天，徐悲鸿的作品在巴黎展出，引起轰动。有好几幅作品被人购藏。这使徐悲鸿深感欣慰，也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

徐悲鸿对国内的情况时时关注。上海‘五卅’惨案后，他的好朋友、剧作家田汉来信，说是国事日艰有要事相商，请他回国一趟。徐悲鸿立即作动身准备。1925年秋天，他只身登上开往新加坡的轮船。

在新加坡逗留了一段时间，卖画筹款，然后回到上海。他和田汉、欧阳予倩等人商定，在适当时机共同创办一所崭新的艺术学院，革新中国的文学、美术、音乐、舞蹈，为中华民族培养新一代的艺术人才。在离开巴黎9个月后，徐悲鸿又回到巴黎。

国内的局势日益险恶，1927年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，向人民举起了屠刀。文化界思想界也是一片肃杀之气。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连在一起的徐悲鸿寝食不安，思国之情不能自抑，常自言自语反复念叨：“要回国去、回国去、回国去。”蒋女士还想在巴黎多住些日子，徐悲鸿尊重了她的选择。

回国前，他游历了比利时、意大利、瑞士等国，广泛了解了欧洲的文化艺术。1927年7月，功成名就的徐悲鸿，怀着变革中国美术的雄心壮志，只身返国。

他在欧洲留学达8年之久。

三、画苑拓荒者

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专制，总是让海外归来的游子失望。拍马溜须之徒擢升高位，耿介刚正之士难得重用，是它的一条不成文法。同在法国学美术的纨绔子弟张道藩，以官场新贵的派头代教育部长陈立夫传话：如果徐悲鸿肯到南京拜望一次，可以安排个

好位置。徐悲鸿的回答是：“我不认识富部长，只认识穷田汉”。不予置理。他和田汉、欧阳予倩把原先商定的办学计划付诸实行，在上海办起了南国艺术学院，自任美术系主任，决心以个人的力量来开始变革中国绘画。他在画室里挂了一副集泰山石径的对联，上联是“独持偏见”，下联是“一意孤行”。这既是他艺术个性的表露，也是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。

对如何培养新一代美术人材，徐悲鸿已有较完整的思想。他认为，学画的人首先应该养成高尚的品格和情操，只有美的灵魂才能画出美的画来。他给新生讲课，第一堂课不是讲画画本身，而是大谈上海的革命历史，希望同学们以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为榜样，以为祖国争取光明的精神来学习绘画。“绘画虽小技，但可以显至美、造大奇，非锲而不舍，勤奋苦学，不易为功。”他始终认为，真实是一切艺术的渊源，离开真实一味抽象，必然导致艺术的衰微。中国绘画的一个最大危机就在这里。“案头摹仿，不见一切”；“人造自来山水”决无前途。所以，他十分强调学生的素描训练，要求一丝不苟的临摹真实景物，以“尽精微”而“致广大”，以“师造化”代替向壁虚造。这就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投下了奠基之石。他特别重视表现人——人在生活中的一切有意义的活动和人的精神世界。他不厌其烦地向学生讲述中外美术史上人物画的思想艺术价值，要求学生除画好人体练习，还要深入生活了解生活。定期画出人物创作稿。徐悲鸿科学、进步的教育思想，使他的众多弟子终身受益，不管美术如何流变，他们终能把握时代的脉搏，逐步成长为人民的杰出画家如吴作人、艾中信、王临乙、冯法祀、侯一民、杨建侯……等等。

面对这样一位大画家，南京教育部也不好意思。南国艺术学院开办后，南京中央大学的聘书也到了。徐悲鸿本不想去，无奈夫人大吵大闹，只好有条件地接受了。条件是不能影响南国艺术

学院的教学，中央大学美术系教半个月，南国艺术学院也教半个月。

蔡元培一直记挂着徐悲鸿，1929年9月，力荐徐悲鸿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。徐悲鸿决心也去冲击一下古都画坛的陈腐空气。他到任的第一次公开言论——就职演说就引起轩然大波。演说的大意是：此次来北平，目的就是改革美术教育。第一要改革学生的观念，学习和研究艺术是学生的天职，不能把艺术、把本院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。第二要改革先生们的门户之见，学院当为“网罗众家之学府”，不应以势压人，排斥、打击不同的艺术流派。望大家为民族艺术的振兴共同奋斗。有人击节赞叹，有人暴跳如雷，还有人要赶走徐悲鸿。

齐白石是有精湛造诣的国画大师，就因为不是科班出身，在北京备受歧视，被人讥为“野孤之禅”。徐悲鸿十年前发现了他，即发一宏愿：如果自己当艺术院长，要聘的第一个教授就是齐白石。现在他可以实行了。他在学院高度评价齐白石，认为可比徐渭、虚谷，可比任伯年、吴昌硕，可同中国画坛上任何丹青妙手媲美。他亲自登门拜望，聘请齐白石为学院教授。齐白石激动万分，曾说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君也”。但终因画坛保守势力太大，而不敢应聘。徐悲鸿因此而激怒不已，任满三个月就毅然辞去了院长之职，重回南方任教。

发现人才，提携后进，并为之奔走呼号、不遗余力，徐悲鸿一生不知做过多少回。早在北大“画法研究会”时期，有一个来自山东乡下的青年跑到他家里，咕咚一声跪下，述说贫苦身世和学画志向，请求拜他为师。徐悲鸿问清这位青年以拉黄包车维持生活和学习，立即答应下来。这位青年就是后来蜚声中外的大画家李苦禅。1931年暑假，徐悲鸿到南昌，看见了青年傅抱石才气横溢的画作，不仅登门拜访，而且亲身向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说

项，请求资助傅抱石出国深造，并送上自己的奔马一幅。傅抱石因此得以留学日本，后来成就之大尽人皆知。徐悲鸿在南昌还发现了长于人物木雕的工匠范振华，于是专程前往范做工的地方水观音亭拜访。范振华午睡正酣，徐悲鸿不敢打扰，等候良久才叹息离去。至于帮助他的学生出国留学，直至帮助他们在国外的学习、生活的事例那是举不胜举的。

毛泽东说：“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一贯地有益于人民，一贯地有益于青年，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。”这最难最难的事徐悲鸿是做到了的。这固然和他青年时代的苦难经历直接相关，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。徐悲鸿懂得，美术事业是整个民族的事业，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继往开来，不是一个人画几张画就能发扬光大的。他常说，教育是他第一位的工作，创作则是第二位的。他在教育园地挥洒的汗水、化费的心血，以及由此对中国美术事业产生的影响，应该说都大于他的创作。

他是一位诲人不倦的严师。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每一个学生，观察他们的优缺点，亲自讲解、亲自动手改画。发现他们有某一长处或进步，他会兴奋得大加称赞，甚至热烈的拥抱、请他吃饭，发现他们屡教不改的缺点或不可取的学习创作态度，他的批评也是很严厉的。他不仅以言教，而且以身教，他不仅教画，而且教作人。他那勤奋、节俭、自奉甚薄的美德，给他的学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。但他不是一位一天到晚板着脸的老师，和学生在一起，他总是谈笑风生，如对朋友如处家人。他又是一个很能团结同事的人，他的热情、诚恳、谦虚、正直，在他任职的地方都有口皆碑。

徐悲鸿一生“爱画入骨髓”，即使在吃饭都成问题的艰难处境中，他还要想方设法购买他喜欢的画。他绘画收入的很大一部

分，都用在购置中外优秀画作上。在北平期间，他常到琉璃厂购买字画。这里的书画店都有几进相连的厅堂，一进门就能看见远处悬挂的画幅。徐悲鸿远远发现喜爱的画，往往边走边嚷：“这幅好，我要了，我要了。”店主因此知道奇货可居，等他走到画幅前，价格已翻了好几倍。亲友劝他不要这样，太吃亏了，他表示接受。但下次再去，他又故态复萌。他有一幅相传为唐吴道子粉本的《八十七神仙卷》，盖上了“悲鸿生命”的印章，却不幸被人偷去。为此他寝食不安，多方寻找。偷盗得以帮助查找为名，从他身上敲去 20 万元的巨款，才将画归还。徐悲鸿知道真相后不仅不怪偷盗者，反而深自庆幸。他搜集佳作的目的，不是为自己为家属，而是为了中国的美术事业。他逝世后，家属根据他的遗愿，将价值连城的收藏全部无偿献给了国家。

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。为了中国美术事业，徐悲鸿也是做到了的。1942 年 10 月，重庆举办“全国木刻展览会”，徐悲鸿去看了。木刻艺术当时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，凡思想右倾的人都不沾木刻的边。徐悲鸿毫不顾忌，边看边加称赞。看完后还写了一篇短文，发表在《新民报》上。文章说：“我在中华民国 31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3 时，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的天才，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”，是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，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的”。并对木刻运动给以很高评价。文章发表后，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全文转载。

这就是徐悲鸿的风格。

四、拳拳赤子心

1931 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，徐悲鸿和全国人民一样，心情悲愤。那一天，他在课堂上慷慨陈词，反复论证中国不会亡，激

励同学们走向前线，与日本法西斯强盗血战到底。他也在思考，作为一个美术家，该怎样奔赴国难，参加拯救国家和民族的战斗行列。不久，他开始创作大型油画《奚我后》。在此前一年，他完成了另一幅大型油画《田横五百士》。两画均取材于中国古代典故，前者表现人民的苦难，后者表现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，寓意深。从艺术上说，既继承了西方古典油画的传统，也融会了中国古典技法，为油画的民族化开辟出新的天地。

光自己在国内画还不够，他计划把中国近代绘画艺术推向世界，让世界了解中国。提高中国绘画艺术在国际上的地位，也就是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。要实施这一计划，指望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是不行的，必须靠自己。经过一番努力，他集中了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高奇峰、张大千等名家以及他本人 300 余件作品，又将自己的住宅作抵押，从银行借到 5000 元现金。1933 年 1 月 22 日，徐悲鸿应法国政府邀请，携画去巴黎。5 月 10 日，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巴黎市中心的国立外国美术馆隆重开幕，法国教育部长和各界知名人士 3000 多人出席了开幕式。展览轰动巴黎，展期一延再延，中国绘画艺术成就使人们大开眼界。法国政府购买了一批展品，专辟“中国绘画陈列室”作永久性陈列。接着，展览又应邀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、德国的法兰克福、意大利的米兰等城市展出，无一地不引起轰动。欧洲美术界和人民群众普遍予以关注，各国报刊发表的充满赞美之词的评论文章达三百几十篇。这在世界美术史上是罕见的。紧接着，英国、苏联又发来邀请电，徐悲鸿很有见地地谢绝了其它国家，接受了苏联政府的邀请。“因为苏联是首先对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国家”，徐悲鸿说。

苏联政府以很高规格接待徐悲鸿，预展那天，苏联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到了。徐悲鸿当场挥笔画马，骑兵元帅布琼尼挤

开人群，幽默地说：“神笔徐，请将这匹奋进不息的战马送给我吧，否则我会发疯的！”引来满场欢笑。应广大观众要求，展览在莫斯科共开放一个多月，有人参观多次仍感到不满足。苏联工农兵群众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很好的艺术鉴赏力，给徐悲鸿留下深刻印象。1934年8月，徐悲鸿结束欧洲之行，载誉而归。历时一年零八个月。

回国不久，徐悲鸿的挚友田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，由上海押解南京。徐悲鸿闻讯，立即前往监狱探视。经他多方奔走，又与宗白华教授共同担保，田汉才得出狱。

1935年，蒋介石50寿辰，已经高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张道藩要徐悲鸿为蒋画像。徐悲鸿一口拒绝，再三相请，还是拒绝。对于这位“最高领袖”，徐悲鸿佩服不起来。他这时的鲜明态度是：谁抗日他就支持谁，谁不抗日他就反对谁。1936年两广事变，陈济棠、李宗仁等以抗日为名，讨伐蒋介石。不知国民党内幕的徐悲鸿深表赞同，离开南京到桂林住了一段时间，在报纸上公开揶揄蒋介石：何谓蒋先生的礼义廉耻？礼者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日本既来，奉送东三省；义者，不抗日，廉者，捐“廉”（上海方言廉、钱同音，买飞机平西南，耻者，阿拉（上海方言我）不抗日，你抗日，你就是无耻。真正胆气豪壮！后来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校园里，徐悲鸿几次与蒋的“銮驾”相遇，他都漠然走开。他曾和亲蒋的一位历史系教授公开辩论，说共产党发明的游击战，把日寇弄得走头无路，这种战术可称“天下第一”。“天下第一”是徐悲鸿赞赏事物的口头禅。1946年，演剧四队在重庆作抗战八年汇报演出，徐悲鸿撰文对他们的成绩大加赞扬，又把反共亲日的国民党奚落了一番。

“七七”事变后，全国抗战开始，徐悲鸿精神振奋，为了宣传抗战和赈济灾民，决心再赴南洋举行画展。1939年1月，转辗到

达新加坡。受到各方热情接待和支持。新加坡总督夫妇、“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主席陈嘉庚等均亲临画展参观。《南洋商报晚报》专门刊登了《徐悲鸿画展》的画刊，许多爱国华侨争相购画。1940年初，又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邀请，到印度举行画展，同样盛况空前。徐悲鸿将筹得的相当美金10万多元的现款，全数寄回国内，资助抗战。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团结战斗，誓死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意志，徐悲鸿在印度大吉岭创作了大型中国画《愚公移山》。这件作品和此前徐悲鸿创作的许多中国画都巧妙地融汇了西画技法，为中国绘画开创了一代新风。1942年底，徐悲鸿从新加坡回到重庆，继续在中央大学任教。

他又把精力倾注于教学。对学生习画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倾向，他大力纠正。鼓励弟子们宁可不当大学教授，也要深入生活，画出好的作品。在他的鼓励下，宗其香走到了嘉陵江畔的纤夫中间，吴作人去了戈壁大沙漠，常书鸿投身于甘肃敦煌石窟。他们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徐悲鸿一刻不停地工作，一边教学绘画，一边筹划建立具有研究性质的中国美术学院。由于长期劳累过度，又得不到家庭照顾，他终于病倒了。患的是严重的高血压症和慢性肾炎，在医院躺了4个月。为抗战筹得大宗款项的徐悲鸿，生病期间的医药费、生活费都十分困难，幸赖为他管理图书的廖静文小姐的悉心照料和筹划，才度过了难关。

1945年2月，徐悲鸿仍在病中，郭沫若来到他的住处磐溪，带来了周恩来送给徐悲鸿的延安小米和红枣，并请徐悲鸿在《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》上签名。当时抗战进入最后阶段，八路军、新四军愈战愈强，国民党军队则节节败退。蒋介石坚持独裁政治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结束一党专政、成立联合政府，以夺取抗战的胜利。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也风起云涌。对这一切，徐悲鸿早就了然于心。他抓起笔，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《进言》

发表后 重庆轰动。国民党气急败坏 派人威胁徐悲鸿 要他撤销签名 登报声明是被骗的。徐悲鸿严词拒绝：“我没有受骗 我对自己的签名完全负责。”他彻底看穿了国民党。

不久 抗战胜利。次年 徐悲鸿北上 就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。行前，他和蒋女士解除了婚约，与廖静文小姐结合。

他要把北平艺专办成一个左派学校。

五、和人民在一起

北上途经上海，徐悲鸿夫妇在郭沫若家中，巧遇周恩来。周恩来握着徐悲鸿的手说：徐先生，我们算是老朋友了！还记得1924年在巴黎公社墙前，我们还合了影……你当时不停地画素描，还摘了两片树叶，悄悄地夹在画夹里。徐悲鸿惊叹周副主席的记忆力。分手时，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：希望徐先生把北平艺专办好，为人民培养出一批有理想、有志气的美术工作者。对此，徐悲鸿完全理解。

徐悲鸿一到校，立即聘请齐白石为名誉教授，亲自乘车迎接老先生来讲课。他还聘请了一大批思想进步、作风正派、业务素质高的中青年画家，来校任教和主持各系工作。如李桦、叶浅予、李可染、蒋兆和、冯法祀等。同时解聘了一批与国民党特务有关系的教员。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是徐悲鸿的老熟人，徐悲鸿特地拜望了他。徐悲鸿的大刀阔斧，令派来监视他的一批党棍、特务目瞪口呆。他们一面将徐悲鸿填上黑名单报送南京，一方面鼓动北平画坛保守势力重演故技，发动“倒徐”运动。可惜今非昔比，徐悲鸿改革中国传统美术的思想，已被很多人理解和接受，污蔑徐悲鸿‘消灭国画’的谬论已没有多少市场。徐悲鸿、吴作人等成立北平美术作家协会，与代表保守势力的北平美术协会公开对

抗。这一次的胜利者是徐悲鸿。

1947年5月20日北平爆发了“反饥饿、反内战”的学生运动，本来就有共产党组织活动基础的艺专，一部分学生、教师积极参加了运动。徐悲鸿利用与李宗仁的关系，使这部分师生得以免遭国民党宪兵的毒手。1948年夏天北平又发生“反迫害、反剿民”大示威，国民党又进行大逮捕，艺专有十几名学生被开除通缉，有4人被捕。又是徐悲鸿出面，将被捕的同学保释出狱。1948年，国民党东北当局欺骗和裹胁数千学生来到北平，竟不予置理。流亡学生食宿无着，找到徐悲鸿，请求帮助。徐悲鸿以极大的同情心，在北京街头绘画义卖，筹款救助。他终生保持着“江南贫侠”的本色。

1948年下半年，北平已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中。艺专的一帮反动分子发动了一场“南迁运动”，要把学校迁往南京。这也正是国民党政府计划中的一件事。徐悲鸿在全校进步师生的支持下，抵制了南迁。国民党当局以名利相诱，两次派飞机接他南下，都被他拒绝。他下定了决心，在这历史转换的关头，一定要和人民站在一起。负责防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，对和战举棋不定，特在中南海召集学者、名流，征询他们对时局的意见。与会者摸不清傅的意图，都不敢贸然开口。徐悲鸿第一个站起来发言，劝傅作义顺从民意，走和平解放的道路，保护好文化古城，使人民免遭涂炭。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，在泾渭莫辨的情况下，很可能招来杀身之祸。那天晚上，国民党特务就在电话里威胁徐悲鸿“小心脑袋”。一天深夜，田汉从解放区化装来到北平，直奔徐悲鸿家。他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对徐悲鸿的嘱托：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北平，在文化界多做稳定工作。徐悲鸿为人民领袖的知己之言而感动，表示一定不负重托。

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。徐悲鸿满怀喜悦，画了很大一幅

奔马 题词道：“百载沉痾终自起 首之瞻处即光明”。在同时期的另一幅奔马上又题道：“山河百战归民主 铲尽崎岖大道平”。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百年奋斗历史的无限感慨，和对人民胜利前程的无比信心。

10月1日，徐悲鸿荣幸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。他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他的目光紧紧追随着毛泽东，当场用画笔把毛泽东那具有无穷魅力的笑容勾勒了下来。不久，他创作了油画《毛主席在人民中间》。

1950年4月1日，中央美术学院成立。由周恩来亲自提名，徐悲鸿担任了第一任院长。毛泽东应徐悲鸿之请，为学院题写了校名。徐悲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火热的生活。他参加土改，他动员抗美援朝，他为战斗英雄和英雄的母亲画像，他为志愿军战士画画，他孜孜不倦地从事美术教育和创作。当新中国第一个改造旧山河的大工程——山东整沐导沂工程开工时，他奔赴工地，为新时代的“愚公”们画像。1951年7月，长期病弱的身体终于承受不住，突发脑溢血，经抢救才脱离危险。大病稍愈，他又忘我的投入工作，1953年9月27日终因再度中风逝世。他为祖国为人民工作到最后的一息。

1957年5月，周恩来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上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徐悲鸿的中国画能融合中西，是继承民族传统和吸收西洋科学技术的范例，我们应该向他学习。徐悲鸿是他生活年代的一位大师。”

（邹耕生）